

# 古代政治文化与奏议文体变迁

## ——以表、状、札子为例

梅 华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奏议在古代多用于臣子向皇帝言事、陈情、谢恩等场合,是君臣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表作为一种文体出现较早,带有某种程序化倾向,其功能在历代多有发展变化。状盛行于唐代,并为后世所沿用,主要可分为奏状与申状,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与体式。札子兴于两宋,用于明清,一般体式简短,一事一札,但发文主体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表、状、札子作为典型的上行公文,每一类均有其独特的源流演变、文体功能与写作要求,其中也蕴藏着特殊的政治文化。

**关键词:**政治文化;奏议文;表;状;札子

**中图分类号:**K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5)03-0116-07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国家治理经验的积累,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由简到繁,日益完善。由于国家政权机构逐渐变得庞大而又复杂,为了能够维持其正常运转,做到上令下行,下情上通,公文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沟通手段。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一套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通过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地实现其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目标。在具体的政治运行过程中,中央及地方官署的各类公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现代政府公文类似,按照发文者与受文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公文同样可以分为上行公文、下行公文和平行公文。奏议类公文属于上行公文,是古代君臣沟通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大凡臣子向皇帝言事、陈情、谢恩等均会用到奏议,故奏议类文体名目繁多。作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政府公文的使用变化情况与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下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相呼应,其文体变迁能够充分而生动地反映出本身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内涵。笔者在此拟以奏议文体中的表、状、札子为例,通过梳理其文体发展变迁,并结合相关的政治文化与历史

演变,以求一窥不同的奏议文体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所隐藏的丰富政治文化密码。

### 一 “表”之变迁与政治文化

表,本有表明、标示之意。如《史记·吴王濞传》载:“……(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sup>[1](P1752)</sup>。后来,“表”逐渐演变为以奏章等向皇帝予以表明、展示。《汉书·隽不疑传》载:“(暴)胜之知(隽)不疑非庸人,敬纳其言,深接以礼意,问当世所施行。……至昏夜,罢去。胜之遂表荐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sup>[2](P3035)</sup>以“表”作为奏议类公文的文体名,最早见于汉成帝皇后的章疏中。《汉书·外戚传》载:“……于是省减椒房掖廷用度。皇后乃上疏曰:‘……故时酒肉有所赐外家,辄上表乃决。’”<sup>[2](P3977)</sup>东汉以后,以“表”来代指章奏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如《后汉书·张纯传》载:“时岁旱灾,祈雨不应,(张奋)乃上表曰:……即时引见,复口陈时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兴洛阳狱,录囚徒,收洛阳令陈歆,即大雨三日”<sup>[3](P199)</sup>;《后汉书·皇甫规传》载:“熹平三年,

收稿日期:2015-05-1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宋代文集序跋研究”(2015SJB243)。

作者简介:梅华(1978-),女,河南信阳人,讲师,文学博士,从事唐宋文学与文化研究。

以疾召还(皇甫规),未至,卒于谷城,年七十一。所著赋、铭、碑、赞、诔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sup>[3](P2 137)</sup>

此外,作为上行公文的“表”,在唐以后还出现了新的变种。宋代有所谓的“笏记”,此应是一种简短的表文。明代吴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宋人又有笏记,书词于笏,以便宣奏,盖当时面表之词也”<sup>[4](P2 092)</sup>;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曰:“笏,勿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之,备忽忘也。”<sup>[4](P2 852)</sup>可见,宋人将表文书写于笏板之上,其目的是方便当面向皇帝进言,同时又以防在面君呈辞时遗忘。“据《记》曰:‘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度,二尺有六寸。’”<sup>[4](P2 852)</sup>笏板一般只有二尺六寸长,这一载体决定了笏记必须简短,并且笏记是面对皇帝时当场宣读,这一场所也要求笏记不能太过繁复,即“表文书于牍,则其词稍繁;笏记宣于廷,则其词务简”<sup>[4](P2 093)</sup>。苏轼《笏记》云:

禁林之选,多士所荣。非独文章之工,俾专翰墨;当属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疏,岂宜尘冒。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刚健纯粹,缉熙光明。曲搜已弃之材,将建无穷之业。顾惭浅陋,将何补于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于生死。臣无任。<sup>[5](86册,P142)</sup>

从内容来看,此文应为苏轼被委官以后所上的谢表。人们将文字写于笏板之上应早已有之,但并没有成为一种文体,只是到了宋代,“笏记”才成为一种类似于“表”的文体。

表作为一种公文体式,在中国古代上行公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历代编者在当初编纂时大多只注重内容而忽视形式,致使现留存于世的一些诗文别集和总集中的表文大多是删去了“表头”和“表尾”的节文,我们现在很难在诗文别集和总集中看到格式规范、内容完整的表文。有关作表的格式,我们只能从一些文献的大概载论中略窥一二。蔡邕《独断》曰:“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sup>[6]</sup>司马光《书仪》“表式”曰:

臣某言(云云)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辞(云云)谨奉表称谢以闻,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年月日具位臣姓名上表。<sup>[7]</sup>

从明清史料中的原始文档可知,后世表文的体式也基本上仍然遵循此一体式。

表文作为一种重要的应用性公文,其功利性、目的性较强,带有较为明显的程序化倾向。明代朱荃宰根据不同的表文,还总结出具有程式化的写作模式:“贺祥瑞”,分四段:“一破题,二解题,三颂圣,四述意”;“谢表”,分四段:“一破题,二自述,三颂圣,四述意”;“进书表”,分四段:“一破题,二解题(或自述),三颂圣,四述意”<sup>[4](P2 797)</sup>。表文的文体性质决定了其有程式化的一面,但综观历朝历代的表文,其中也不乏情文并茂之作,如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孔融的《荐祢衡表》、羊祜的《让开府表》等。

自从作为一种公文形式出现以后,表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在具体功能及风格等方面也经历过较大的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特点。

表文的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汉朝表文主要用于陈请。魏晋以降,表文的功能不断扩大而且名篇多见。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描述道:“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逮晋初笔札,则张华为儒。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鹤鹑》,莫顾章表。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sup>[8](P207)</sup>

唐宋时期的表文相对前代而言,较为明显的变化是进书表增多,如唐代萧颖士《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王维《为韩和尚进注仁王经表》等,宋代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窦仪《进刑统表》等。由于唐宋时期进书表众多,人们按照进书种类的不同,对表文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写作要求:“进书一门,诸书体制各不同。玉牒乃纪大事之书,国史乃已成纪传之书,实录乃编年之书,宝训则分门,日历则系日,会要则会粹,各是一体。若出进玉牒表,须当纯用玉牒事,不可以他事杂之。举此一端,其余皆然。若泛滥不切,可以移用,便不为工矣。”<sup>[4](P971)</sup>

由于受到当时主流文学风格的影响,不同时代的表文风格也多有变化。汉晋时期的表文多用散体,文风相对朴实,词语简练,正如刘勰所说:“魏初章表,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sup>[8](P207)</sup>唐宋时期的表文则有四六体,对仗工整,排比铺叙,用事精当。但唐宋体又各有不同:“唐人声律,时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浑之风;宋人声律,极其精切,而有得乎明畅之旨,盖各有所长也。”<sup>[4](P2 792)</sup>清代孙梅《四

六丛话》中选录了大量唐宋时期杰出的表作,将这些作品对比更能体会唐宋时期表文之异同。

通过考察表类文章可以发现,其发展与中国古代政治的演变密切相关,特定历史阶段人才选拔体制的变革对奏议类公文的流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检诸史料可知,东汉二百年间,表文数量大增,并逐渐成为上行公文的一种主流体式。以笔者拙见,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与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有关。东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针对政府选拔人才的察举之制存在的弊病,提出了改革的建议。对于郡国举荐的孝廉人选,左雄主张朝廷不仅要在年龄方面进行相应的限制,而且还要对他们进行相应的考试;认为只有严格程序,确保公正,才能选拔出真正有才之士。《后汉书·左雄传》载:“(左)雄又上言:‘……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试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sup>[3](P2020)</sup>在此,所谓“文吏试笺奏”,实际上就是考试章表。故自东汉察举改试章表以后,表文大兴。东汉安帝亲自主持对孝廉的章表考试,胡广被取为第一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道:“后汉察举,必试章表;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表,天下第一。”<sup>[8](P207)</sup>刘勰所言正是上述东汉一朝有关奏表的典章文化。

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左雄对郡国举荐孝廉加试章表的改革对公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到魏晋时期作为奏议文体的表文已经大行其道了。曹植因争位失败,在其兄曹丕称帝之后,为求得其谅解,就曾多次拜表上奏。如黄初四年,曹植徙封雍丘王时,曾“上疏曰:臣自抱衅归藩,刻骨刻肌,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谨拜表献诗二篇”<sup>[9](P563)</sup>;太和三年,曹植徙封东阿以后,又上疏曰:“……不胜愤懣,拜表陈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书府,不便厌弃,臣死之后,事或可思。”<sup>[9](P570)</sup>在这一时期,一些文人甚至以擅长章表而闻名于世。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长于章表书檄,文气贯注,笔力强劲,风格雄放,在当时与阮瑀齐名。曹丕曾评价道:“孔璋(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sup>[9](P602)</sup>

自东汉以后,经魏晋,历唐宋,终明清,章表考试一直都是官吏选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据王应麟《辞学指南》记载,唐代的进士考试曾以制“表”作

为考试内容,如唐显庆四年(659),进士试考《关内父老迎驾表》;开元二十六年(738),又试《拟孔融荐祢衡表》。由于历代统治者均重视、强调对章表的考试,应试者对于如何应对必然要作相应的准备。对此,古人的做法是,“灯窗之暇,将可出之题件件编类,如《初学记》《六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广博搜览,多为之备”<sup>[4](P972)</sup>。这就需要注意平日的积累,做到厚积薄发,到考场上方可随机应变,应付裕如。因此,古人多有强调积累之功者。王应麟曾道:“如出一贺册表,非胸中有五六件册宝,如何展布得一篇?又有不可测者,如宣和间《顺州进枸杞表》,固非场屋中出,万一试日或遇此题,平时不知枸杞为何物,焉能作灵根夜吠之语哉。”<sup>[4](P971)</sup>当然,这种纯粹为了应试而作的表文,多流于程式化,虽有其实用性,但大多文学性、艺术性不佳。

## 二 政治运作下“状”之形态

汉代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曰:“课吏,长吏不称职者,为殿举免之;其有治能者,为最察,上尤异;州又状州中吏民、茂才异等。”<sup>[4](P6299)</sup>其中“状”为陈述的意思,向上汇报一地吏民之杰出者。何休又道:“岁尽,贡所状纳京师,名奏事。”此处,所谓“状”,即向皇帝“奏事”之意。故早期的“状”只是指向上陈述一地官民情况的一种行为,还不具备文体意义。清代王兆芳《文章释》曰:“状者,犬形也,形貌也,官民之事臧否之形状也。”<sup>[4](P6299)</sup>可见,“状”的本义是指事物之形状,后来引申为褒贬官民之事的一种行为。

根据“状”类公文之内容和功能,可将其分为礼仪性的“状”和政务性的“状”。前者主要用于谢恩、贺喜、进贡、让官等,此类公文与一些表文类似,所以被称为“表状”,如韩愈《皇帝即位贺诸道状》、李德裕《进元宗马射图状》等;后者主要用于议事、奏事、弹劾等,如韩愈《论淮西事宜状》、李德裕《论朝廷事体状》等。根据受文对象之不同,“状”又可分为“奏状”和“申状”两种。

“奏状”的受文对象为皇帝,发文者是个人或某司。司马光《书仪》中“奏状式”云:

某司(原注:自奏事则具官,帖黄节状内事)

某事(云云)(原注:若无事因者,于此便云右臣)

右(云云)(原注:列数事,则云右谨件

如前。)谨录奏闻,谨奏。(原注:取旨者则云伏候敕旨)。

乞降付去处。(原注:帖黄在年月前)

年月日具位臣姓名(有连书官,即依此列位。)状奏<sup>[7]</sup>

由此“奏状式”可知,一份完整的“奏状”应包括三部分:“状头”包括发文者、因何事发文;奏状的正文;“状尾”,即结束语。发文者可以是某个政府部门或机构,如韩愈《贺太阳不亏状》,其“状头”曰:“司天台奏:今月一日,太阳不亏”。此发文者为“司天台”,因“太阳不亏”而发文。“状”的发文者也可能是某个官员,又如韩愈《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其“状头”曰:“某官某乙。”<sup>[10](P5562)</sup>

“申状”的受文对象为上级官署,发文者则与奏状一样,可以是个人或某司。宋代司马光在其《书仪》中,将此类“状”的格式总结为“申状式”:

某司(原注:自申状,则具官封姓名)

某事(云云)(原注:有事因,则前具其事;无所因,则便云右某)

右(云云)。谨具状申。(原注:如前列数事,则云右件状如前云云)。某司谨状。(原注:取处分,则云伏候指挥)。

年月日。具官封姓名(原注:有连书官则依次列衔)状。<sup>[7]</sup>

与前面提到的“奏状式”比对,我们可以轻易发现两者在书写格式上之异同。在“状头”部分,“奏状”和“申状”格式雷同,均为发文者和因某事而发文;正文部分就事论事,也无太大差异。最大的不同在于“状尾”部分,为了强调突出,笔者用着重号将其标出。“奏状”的结尾部分为“谨录奏闻,谨奏”,要想得到皇帝的“旨意”,则曰“伏候敕旨”;而“申状”的结尾部分为“谨具状申”,要想得到上司的命令,则曰“伏候指挥”。奏状与申状在受文对象上有明显的区分,皇帝称“奏”,上级称“申”,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状类公文的发展变化,能够直接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包括政府机构设置等在内的政治文化演化的影响。

在现存文献中,较早记载以“状”的形式向皇帝奏事的是《汉书》。《汉书·赵充国传》:“充国上状曰:‘……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sup>[2](2987)</sup>此篇奏状保存在《全汉文》中,即《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魏晋六朝史料也有对“状”的记载:《晋书·张轨传》:“令有司可推详立州以来清真德业……

谄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sup>[11](P2224)</sup>;《魏书·高祖纪》承明元年(476)八月甲子诏曰:“群公卿士,其各勉厥心,匡朕不逮。诸有便民利国者,具状以闻。”<sup>[12]</sup>可见,“状”之向上奏事的功能在汉魏时期已初步具备,而以“状”为文章命名则始于赵充国《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之后又有张敞《条奏昌邑王居处状》、阙名《置五经博士举状》、孙权《白曹公状》。

然而,作为唐以前文章总集的《文选》未列“状”体一类,《文心雕龙》也未对“状”体文作过评论。由此可以推知,唐代以前作为文体意义上的“状”尚未成熟,至唐代此种奏议文体始兴盛起来。近人吴曾祺《文体刍言》“状类”云:“论事之体,与奏疏同。谓之状者,谓条其事实而上之。汉以前传者有赵充国一篇,唐以后此等文甚多。”<sup>[4](P6643)</sup>由于唐代出现了大量的“状”类文章,故宋人李昉等编《文苑英华》时专列“状”一目,其中将“状”细分为六类,即谢恩、贺、荐举、进贡、杂奏、陈情。此为最早选录“状”类文体的文章总集,同时也确立了“状”类文章的文体意义。

唐代状类公文的发达,应该和唐代三省六部使职差遣体制的演化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唐六典》门下省侍中条载:“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sup>[13]</sup>可见,唐门下省“六书”,“状”居第六。据刘后滨先生解释:“这里所谓‘上’,不是泛指相对于各个下级而言的上级,而是相对所有臣民的‘皇上’,这是六种上于皇帝的文书。”<sup>[14]</sup>据《旧唐书·职官二》记载,尚书省所用文书曰:“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辞、牒。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上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辞也。”<sup>[15](P1817)</sup>尚书省“六书”中,只有“表”“状”两种文体可以直接呈于皇帝。

唐代立国之后前承隋制,设三省六部管理中央政务,百数十年下来,律令制度已臻完备,政事之处理皆依故事,前后相因遂成定制。但时移则世易,世易则事变,随着情况的变化,一成不变的制度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所有政事仍依数十年前故事而行,已经不符合时宜,故对固有机机构及律令制度之突破势在必行,如唐高宗曾对李晦道:“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脚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隋事即行,不须闻奏。”<sup>[15](P2350)</sup>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唐代的三省六部机构设置之外逐渐出现了

使职差遣制。如果按照以往的制度成例,大部分的政事均要通过尚书省才能奏报皇帝裁决,但皇帝通过使职差遣,让特奉制敕的近臣直接参与重要政事的处理,绕过繁杂的官僚层级,以状类文书直接向皇帝汇报,故《旧唐书·职官二》曰:“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sup>[15](P2350)</sup>故近臣向皇帝奏事、论事以及谢恩、荐举等都会用到“状”。

时间既久,直接上奏皇帝的状越来越多,皇帝在实际政务中即使再勤政也处理不过来。因此不得不将奏状再次分流处理,只将部分有真正需要的奏状,才向皇帝奏明,而其他的一些奏状需先申三省,由三省决定其是否上奏皇帝。《唐会要》“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载:“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请。敕到省,有不利于事者,省司详定闻奏,然后施行。”<sup>[16](P986)</sup>大历十四年(779)六月敕曰:“天下诸使及州府,须有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委仆射以下商量闻奏,不得辄自奏请。”<sup>[16](P987)</sup>故吴丽娱先生指出:“‘奏’专用于皇帝,所以这一层次(笔者注:即上给尚书省诸司之‘状’)的上状就改用‘申’。”<sup>[17]</sup>唐代根据受文对象而对“奏状”与“申状”所作的区处,至宋代仍为各级官衙僚属所一直遵行。在宋人的别集中也能看到两者之区别。若受文者不是皇帝,常常会在“状”文题目中冠以“申”字,如朱熹《申省状》《申登闻检院状》等。

### 三 “札子”之政治功能

在纸张发明以前,札子本来是古人用来书写文字的竹木片,后来人们也把写在木简上的文书称为“札”,如《晋书·索靖传》载:“(索綝)少有逸群之量,(索)靖每曰:‘綝廊庙之才,非简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污吾儿也’。”<sup>[11](P1650)</sup>到了两宋时期,札子成为官厅衙署普遍应用的一种公文名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曰:“七国之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宋人则监前制而损益之,故有札子、有状、有书、有表、有封事,而札子之用居多,盖本唐人榜子、录子而更其名,乃一代之新式也。”<sup>[4](P2094)</sup>以后历代文书体制虽有发展变化,但到明清时期仍可在公文中见到札子的身影,如明代霍韬《初政第二札子》、清代李光地《御制论诗发示覆奏札子》。历代文章选本也多将“札子”单列一目,宋代王霆震《古文集成》将文章分为二十类,“札子”居第五,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将文章分为十六类,“札子”居第十三。

札子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作为上行公文,即奏札;另一种作为下行公文,即省札。作为下行公文的省札,是从唐代的“堂帖”演变而来。关于唐代的“堂帖”,唐宋时期史料多有记载。《唐国史补》云:“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sup>[18](P49)</sup>沈括《梦溪笔谈》亦云:“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人之堂札子也。”<sup>[19](P24)</sup>可见,唐代宰相常用“堂帖”管理四方之事,这种文书制度一直持续到北宋初期。徐度《却扫编》曾云:“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国初犹因此制。”<sup>[20](P130)</sup>北宋初期赵普任宰相,“权任颇专”,使宋太祖觉得“堂帖势力重于敕命”,故下令禁止中书门下之堂帖,用“札子”取而代之。至此之后,“札子”一直是两宋时期一种重要的下行公文,根据发文机构不同,省札又可以分为有御札、中书札子、枢密院札子、帅札等。对于省札,笔者不拟过多论议,在此重点关注一下奏札,即作为上行公文的札子。

作为一种上行公文,“札子”从文体功能上看,与盛行于宋代的表、状、疏等奏议类文体相似,也可分为礼仪性札子和政务性札子。从文体体式上看,札子一般比较简短,大多是一事一札,并且大臣上殿奏事不可超过三札。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载:

臣僚上殿札子,末概言“取进止”,犹言进退也。盖唐日轮清望官两员于禁中,以待召对,故有“进止”之辞……今乃以“可否取决”之辞,自三省大臣论事皆同一体,著为定式。<sup>[21](P53)</sup>

据《庆元条法事类》载:“其用札子者,前不具官,不用右,不用年。改状奏为札子,事末云‘取进止’(在京官司例用札子奏事者,前具司名)。”<sup>[22]</sup>由此可知,札子起首不写明官职,不标注“右”字(两宋时期其他“状”类文书,文首皆标注“右”字),只署名发文人名字即可。在行文结束时,札子多以“取进止”结尾,意思是听候皇帝旨意,以决行止。

通过考察札子类文书的应用,可以窥见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经过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与战乱,北宋开国之后,君臣有鉴于此前数十年间统治秩序崩坏,帝王权威扫地,注重加强君主权威,重建封建秩序。据《宋史·范质传》载:“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等憚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

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寝多，始废坐论之礼。”<sup>[23](P8 795)</sup>唐五代时期，宰相与天子以“坐论”的形式讨论国家大事，到了北宋初期范质等人担心“坐论”时会出现纰漏，于是事先将自己要面陈皇帝的奏事内容写成札子。诚如清代王兆芳总结云：“札子者，札，刺箸也，刺箸所言以代坐论者。宋臣下可面奏，而用札子免疏失。”<sup>[4](P6 301)</sup>可见，到了宋代，由于君主专制的强化，宰臣与天子坐而论事的待遇被废止，大臣面陈皇帝时改用札子奏事。以此之故，札子这一文书形式在宋代开始盛行起来。

在札子成为经常使用的上行公文以后，宋代朝廷曾对于运用札子进行奏事的主体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或者说作了相应的限制。欧阳修《归田录》云：“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子，亦谓之录子，今谓之札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札子。”<sup>[24](P29)</sup>欧阳修这段话除了告诉我们宋人用“札子”奏事外，似乎还向我们传达了宋人使用“札子”的场所和对象——群臣百司只有上殿面陈皇帝时才可用“札子”，而“非时”是指不上殿面陈时，这个时候只有“两制以上”者才可使用。同样的表述在《庆元条法事类》卷16“文书”中也有体现：“诸臣僚上殿或前宰相、执政及外官奏军机密速，听用札子。”<sup>[22]</sup>依据该条法规，除了上面提到的上殿呈事之大臣及宰相和执政外，还有外官奏军机大事之人。因此，在制度规定上，除了上殿面陈者用札子外，在其他情况下只有高级官员如宰相、执政等才能用札子奏事，正所谓“依故事，在外惟前两府，在内惟大两省许用札子奏事，他官皆用奏状”<sup>[25](P964)</sup>。由于札子更容易得到皇帝亲览，皇帝对札子所反映的问题会更加重视，故很多级别较低的大臣也往往擅用札子奏事。当然，这种越级使用札子奏事的行为违反了朝廷有关文书制度的规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公文办理程序。因此，在宋代史料中可以发现一些官员因越级使用札子而受罚的事例。周辉《清波别志》记载：“降太康县驻泊巡检、右侍禁张孚，为雅州庐山县都监。坐用札子奏事也。故事，在外惟前两府，在京两大省，方许用札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状。一巡检使臣，敢以札子直达御前，固已可骇。在当时通进司亦何敢传奏？今昔法制，宽密不同如是。乃宝元、庆历间事。”<sup>[26](P139)</sup>由于张孚只是一个巡检使，却妄用札子奏事，故被贬往远恶州县降级使用。这是北宋中期的事情，到了南宋时期这种对越级使用“札子”奏事者的惩处性规定应依然存在。朱熹知南康军时就曾因越级用札子奏事而

诚惶诚恐，不得不再上一道“自劾不合用札子奏事”的奏状：

臣僚札子奏：“臣窃见旧制，章奏凡内外官登对者，许用札子，其余则前宰执、两省官以上许用札子，以下并用奏状。乞申严有司，应帅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机，许用札子，余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则令所属退还”等事，三省同奉圣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疏，不识事体，近于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军陈乞蠲减税钱事，曾具札子奏闻。虽在上项指挥之前，实亦有违旧制，闻命震恐，不知所为。即欲具奏自劾，又恐复以狂妄，重干典宪，谨具状申尚书省，欲望敷奏，亟行罢黜，以为疏远小臣慢上不恭之戒。”<sup>[5](244册, P21)</sup>

朱熹应减免税钱之事而越级用札子奏事，此后知道相关制度后甚是忧惧，故向尚书省上一道“申状”以作自我检讨。

两宋有关对“札子”使用权限的规定，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朝廷政务处理的流程以及某种特定的君臣交流方式。宋代形成定制的“札子”，成为奏议类文体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

总之，作为古代公文形式之一种，札子特别是在两宋时期被大量运用于朝廷政务，其程式简单，运用灵活，但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对于札子的运用主体却有着严格的规定，上下等级有差，逾越者可能会受到朝廷的严厉责罚。

通过以上的考察分析可知，作为古代政治文化组成部分的奏议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体制和官僚制度的，并在政务运行管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沟通作用。历朝历代奏议类文体名目繁多，其中既有重复又有新式，要想彻底理清每种文体，殊为不易，而每类奏议文体所包含的政治文化也大相迥异，各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

####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4] 王水照. 历代文话[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5]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 [6] 蔡邕. 独断: 卷上[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 司马光. 书仪[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 刘勰. 文心雕龙[M]. 范文澜, 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 社,1958.
- [9]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10]董诰.全唐文:卷549[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魏收.魏书:卷7[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2.
- [13]张九龄.唐六典:卷8[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M].济南:齐鲁书社,2004:99.
- [1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6]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17]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G]//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46.
- [18]李肇.唐国史补: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19]沈括.梦溪笔谈:卷1[M].胡道静,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57.
- [20]徐度.却扫编:卷上[M].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G].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 [21]叶梦得.石林燕语:卷4[M].侯忠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 [22]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16[M].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藏版,1948.
- [23]脱脱.宋史:卷24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4]欧阳修.归田录: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5]徐松.宋会要辑稿[M].仪制七之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57.
- [26]周辉.清波杂志附别志:卷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The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of Zouyi's Style ——Taking for Examples Biao, Zhuang and Zhazi

MEI Hu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in ancient times used for the courtiers to report important things, im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thank emperor for his kindness, are an important way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monarch and his subjects. As an article style, Biao with some program tendency appeared early, its function changed greatly in the past time. Zhuang, prevailing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followed in later gener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memorial Zhuang and declarating Zhuang, and the two each have their own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different styles. Zhazi, prevailing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follow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short in formatting, its rule being one thing in an article, but the applying subjects are more stringent restrictions. Biao, Zhuang, Zhazi as the typical upstream documents, every category has a uniqu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stylistic function and writing requirements.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Biao; Zhuang; Zhazi

(责任编辑 书华)